

执政资源嬗变视角下 国共两党地位的历史逆转及当代启示

申富强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山东 济南 250103)

〔摘要〕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执政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国民党在大陆期间,其执政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又是如何流失并导致其崩溃的?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不断汲取执政资源并发展成为一个在全国执政党的?从执政资源的嬗变考察国共两党地位的历史逆转,不仅可以更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执政资源;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执政道路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7)01-0051-07

DOI:10.14110/j.cnki.cn-37-1059/d.2017.01.010

事物由量变到质变是一个不变的规律,执政地位也是如此,能否获取和拥有足够的执政资源是政党能否取得执政地位和维护执政地位的关键因素。从执政资源的嬗变审视国共两党历史地位的逆转,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国共两党执政资源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演变

从执政资源的视角来看,1927年,国民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的南京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曾经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标志性贡献,社会影响力大,历史资源丰富;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继续享用了因国民党改组带来的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如果没有孙逸仙,1923—1924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①。在经济资源方面,苏联1923—1926年“三年间为国民党提供的军火和财政援助累计超过3000万金卢布。正是在苏联的强力输血下,国民党拥有了较强的人力物力资源,北伐军才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版图中的一支决定性的力量”^②。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在“1927年4至5月,仅仅两个月间,蒋介石就获得了4000万银元的融资”^③,经济资源愈发充沛。

取得执政地位的同时,国民党的历史资源却随之受损。“为什么呢?他们都不过是中国民族资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干部任用中的五湖四海原则研究”(项目编号:15BDJ0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申富强,男,法学博士,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②③ 宋鸿兵《货币战争》第3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0、80页。

阶级的代表,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要革命,却又没有力量去完成革命,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要工农革命势力起来,却又害怕工农革命势力起来以后妨碍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总不免妥协动摇。”^①伴随着国民党这种“妥协动摇”,在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②。这种行径使其历史资源大打折扣。

从组织上看,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出于自身的利益,吸收任用了大批土豪劣绅加入国民党和担任基层政权管理者,“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③。以山东省为例,根据当时《山东省政府公报》的数据,从1930年9月到1931年7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山东108县中,因贪脏渎职等原因被撤职的县长就多达55人^④。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在反思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时说,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不健全。可见,其存在组织上的严重问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权力的运用模式也影响着政治资源的稳定。1931年11月29日,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在上海被秘密杀害。宋庆龄得知后于同年12月19日公开发表《宣言》,严厉指出,中国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的领袖。宋庆龄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这些话证实了蒋介石的独裁深深影响着国民党权力资源的巩固。

能否形成精神文化以及利益认同是意识形态资源能否维持和扩大的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曾经是国民党革命和夺取执政地位的重要资金来源方。但出于自身特殊利益,国民党执政后开始培植和发展新的官僚资本、保护买办资本和依靠国外资本。“以纺织业为例,1930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纱锭14余万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40—50万枚。1931年,民族资本工厂增加6万枚,在华日本工厂则增加10万余枚”^⑤。这种极大的差异,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失望情绪与日俱增,同国民党政权的裂痕日渐扩大”^⑥。国民党意识形态资源随之流失。

经济资源的扩大为国民党维护执政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撑。“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又获得了一次短暂的发展机遇。1927年—1936年,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到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近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初具雏形。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电力工业年平均增长9.4%;煤炭工业为7%;水泥工业为9.6%;钢为40%”^⑦。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教育建设也呈现出上升势头,因而,这十年甚至还被“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称为“黄金十年”^⑧。这一阶段,某种程度上来说,相比经济资源,国民党的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资源却不尽人意,甚至在减弱。不能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科学施政,使国民党丧失了第一次扩大执政资源的历史机遇。

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决定独立进行革命,逐渐汇聚起自身的执政资源。

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不仅使中共的组织资源日渐成熟,而且其意识形态资源更加符合实际并得到扩大。1927年9月,秋收起义余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了连上。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

① 《恽代英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1页。

③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

④ 丘涛《中华民国反贪史制度变迁与运行的衍异》,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⑤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232页。

⑦ 杨红林《日本侵华终结“黄金十年”》,《环球时报》2006年6月8日。

⑧ 栗爱斌、宋绍松《美军战将龙虎榜》,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84页。

《古田会议决议》约3万余字,共8个决议。“《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思想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在军队建设方面,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军队的界限”^①;“在党的建设方面,决议着重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决议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教育党员要用马克思列宁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②,否则脱离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要坠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③,并提出发展党员的具体条件等一系列标准等。正确的思想指引和明确革命目标使中共及其军队的自身建设得到升华。

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使中共的公信资源开始扩大。1930年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全军3万余人,成为全国当时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部队。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在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具体领导下,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的第一、二、三次“围剿”,并扩大了赣南、闽西根据地,使其连成了5万多平方公里、拥有250万人口和21座县城的、全国最大面积和实力最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和实施,1931年11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共开始局部执政。

公信资源的大幅增加,进一步丰富了中共的历史资源。以对待腐败为例,“中央苏区首先加强了惩处力度,对影响恶劣的腐败干部予以公审枪决;其次,成立了工农监察部(工农检查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等,加大了监督力度和审计力度;再者,就是从1932年3月起,利用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开辟专栏给予曝光,这是当时的一大创举,可谓开了中共舆论监督的先河”^④。另外,苏区还制定了有关法律,依法开展反腐。如1933年12月15日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中就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⑤等。经过一系列强有力的反腐措施,苏维埃政府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长征使中共的历史资源厚重、政治资源扩大、意识形态资源升华。长征途中,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此后,其充分利用国民党执政资源和执政能力的局限,击退上百万国民党的追兵阻敌,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最终于陕北胜利会师,打开了新的革命局面。“分散在这片国土上不同区域内的红军,历尽苦难和牺牲转战大半个中国,令之前从未见过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的百姓了解到他们的政治信仰与社会理想,反对剥削和压迫,建立公平和平等,而工农革命将给予劳苦大众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⑥长征途中,中共还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吹响了全民族觉醒和奋起的号角。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实践证明,长征尽管使中共的总兵力损失将近四分之三,但“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⑦。

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执政资源的异动

西安事变对于国共两党来说都是一个拓展执政资源的历史机遇。当时,“南京若再继续对日妥协,

①②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程》第1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2~293、293、293页。

④ 申富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执政道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4页。

⑥ 王树增《长征,信仰的力量》,《新华文摘》2016年第22期。

⑦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2日。

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①。中共审时度势,最终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随即又主动于7月15日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并担负抗日前线的职责。同月31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正式宣布抗日。“全国人民精神振奋,各种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海外侨胞纷纷捐款,并派儿女回祖国参加抗战,全国一派新气象”^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极大缓解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的负面印象,其政治资源得到加强,历史资源也得到激活和进一步丰富。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资源也随之扩大。

中共方面确定了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的指导思想。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于1941年1月20日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当局以大局为重,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并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目的,声讨国民党政权的罪行。同日,中共还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做好随时反击国民党武装进攻的准备。同时,中共还积极联合和团结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起行动采取反制措施。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共同推进民主改革和反对内战。代表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③。同国民党遭受的巨大“责难”相比,中共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来自多方面的同情,“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④。从而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扩大了执政资源。

政治资源方面。1941年11月6日,皖南事变后,出于大局考虑,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⑤这一时期,中共始终坚持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团结了众多的党外力量。1942年1月28日,中共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规定》,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施行较温和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0%),最高不超过一分半(15%)。”“正租以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⑥。1942年,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从1941年总收成的13.58%降为11.14%^⑦。这一系列决策赢得了众多赞誉,使中共的政治资源变得更为广泛。

经济资源方面。1939年春,毛泽东在延安号召抗日根据地自己动手发展经济。陕甘宁边区还专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专门负责指导生产工作,提高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自给能力。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迅速,公营纺织厂由1938年的1个增加到23个,年产量由125匹增加到32928匹;另外还有造纸、化工、制药、炼铁等工业,基本克服了中央苏区当时的经济困难。1945年,边区的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62.6万亩扩大到1425.6万亩,边区农民大部分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手工业合作社达到591个,每月生产总值达32亿元(陕甘宁边区货币),各类商业合作社达435个,社员24万人^⑧。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把“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⑨。当时,连“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

① 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②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1937—1975)(下),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84页。

③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⑤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7、1044页。

⑥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2、600页。

⑧ 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8~100页。

满天赞誉”他们甚至还认为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的太远了”^①。“抗日民主政权因而赢得了广大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最可靠的政治合法性基础,民力、物力源源不绝”^②。其经济资源极大增强的同时也增强了政治资源。

历史资源方面。中共局部执政的陕甘宁边区延续了在苏区的优良传统,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③。“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因为他们有全体人民做后盾,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和勇气,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④。据当时美军观察组的卡罗尔·卡特写道“共产党……士气高昂,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共产党最大的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而他们的精力、活力和真诚使他们与腐败化的国民党形成鲜明对比。”^⑤中共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优秀历史资源得到进一步丰厚。

同时,中共始终为了维护抗战大局和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而忍辱负重,使得其意识形态资源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治力量,为了振作大后方军队的士气,早日夺取抗战的胜利,都希望国民党进行改革。但“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⑥,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便会无法挽救”,而“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⑦。1945年4月27日,在历史紧要关头,中共非常清醒地要求进行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而“果能如此,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⑧。可见,两党对如何把握历史机遇、拓展自身执政资源的认知差异是多么的巨大。

三、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执政资源的剧变

抗日战争胜利使国民党的执政资源得到空前增加。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向全世界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迎来了浴血奋战后的胜利。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达到了顶点。同日,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华民国与苏联友好同盟条约》,苏方承诺给予中国的各种援助,完全归国民政府拥有和支配;也是在同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日军受降的第一号命令,命令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海陆空军,只能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投降^⑨。其执政资源急剧扩大。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率代表团于1945年8月29日飞赴重庆。经过妥协和让步,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国共“双十协定”。中共提出承认自己及解放区合法地位的要求的同时,也已明确表示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愿意“彻底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⑩。当时,对于国民党,不仅老百姓普遍“没有想到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而且“许多共产党

①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00~701页。

② 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264页。

⑤ [美]卡罗尔·卡特《延安使命:1944—1947 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⑥⑦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223、1109页。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1949年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

⑩ 《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①。如果国民党遵守“双十协定”，“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②，不搞内战，兑现诸如“耕者有其田”等政治承诺，那么必将能够扩大因抗战胜利带来的丰富的政治资源、意识形态资源，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内战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经济资源的崩溃。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执政风险意识极其低下，被抗战胜利带来的利好冲昏了头脑，无视中共已有党员120余万、正规军120万、解放区人口已超过1亿、民兵已达220万^③等现实，反而一意孤行，仍企图通过自己的“枪杆子”维持其一党独裁的执政地位。1946年6月，其完成军事部署之后，在抗战后国内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这种极端滥用武力再次发动内战的行径，不仅遭到广大人民群众最强烈、最彻底的反对，也使当时的美国对华特使马歇尔、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感到不安。马歇尔认为，共产党之军队及民众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视的程度，纵使采取最残暴之方法予以毁灭，亦非纯赖军事行动所可奏效。司徒雷登认为“中国政府在目前，系以军事上之冒险行为，以应政治调整之需要。内战之延续将使国家经济日益枯竭，并使任何恢复发展经济之企图成为笑谈。”^④也是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七八月间，美国驻华军队司令魏德迈对国民党领导的政府提出强硬批评，并严厉地警告说“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果断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国民党方面轻蔑地回绝了魏德迈的改革要求”^⑤，最终导致美国所决定的“对国民党的政府实行有限援助的政策”“并没有使任何人满足，也没有任何收获。它不能延缓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上的灾难”^⑥。而事实也正是如此，以1948年6月为例，国民党政权政府财政赤字达4345656亿元法币，而其当月的收入只占支出的5%。以上海为例，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上升135742倍，原定额发行20亿元的金圆券，到1949年5月竟达679458亿元^⑦，仅仅几个月，其价值就已形同废纸一般。

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资源和政治资源也开始快速流失。日寇投降后，“来自重庆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员，成了这一时期的象征。根据流行的说法，这种人关心的是五子，即条子（黄金）、车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⑧，“因为接收的太不像话，以致街头巷尾流传有‘人心思汉’（汉谓汉奸）、‘收复失地，丧尽人心’等语。可怜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最后却带来了一场‘胜利的灾难’”^⑨。这些官员在大会小会上义正辞严的大讲三民主义，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完全放弃了理想信念，极尽豪华奢侈之能事，民众怨声载道。

与国民党执政资源急剧流失相比较，中共在解放区内不但一直坚持抓好自身建设，而且实行民主，积极推行“土改”，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从而极大地获取了执政资源。这无疑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实施的一系列错误执政策略，使其第三次丧失了扩大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的历史机遇。

中共政治资源对国民党的彻底超越。1949年4月1日至15日，国共双方代表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国民党政权仍拒绝签字。4月20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占领国民党政权首都南京，国民党政权被迫迁往广州。据统计，从1946年7月至1949年7月三年中，国民党损失了569万人，其中被俘

① 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52~35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9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7页。

④ 牛钊《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反省》，《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⑤⑥⑧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2、782、735~736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2页。

⑨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虏的人数达到了70%，即415万人，而俘虏中有287万变成了解放军。中共“就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解放过来的战士，依靠这批由敌人手中缴获过来的武器弹药，回过手来战胜了敌人”^①。

中共的历史资源在政治动员能力上也完胜国民党。1949年8月，美国在当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指出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太腐化，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而中共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仅东北解放区就有160万人参军，在华北也有近百万人参军，山东解放区也多达60万人参军。另外，山东解放区还出动支前民工580万人，东北解放区参加支前的民工也多达313万人^②。各解放区的农民还将粮食、被服等物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积极配合解放军作战，这与国民党执政资源的不断流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在选人用人上，国共两党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影响着两党意识形态资源的消长。毛泽东讲“五湖四海”，蒋介石搞“黄埔浙江”^③。如，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王稼祥获得的选票因没有达到半数而落选。在中共七大第二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代表发表了《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在会上，他力荐王稼祥并列举了王稼祥的历史功劳，最后王稼祥以第二高票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王稼祥的当选对于中共团结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部门的同志，有过意见分歧甚至冲突的同志，犯过错误的党内同志，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蒋介石是依靠“黄埔系”起家的，而且他主要使用“日本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的所谓嫡系。他在关键岗位的用人问题上还讲究同乡渊源，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被称为“蒋介石的影子”的陈诚，陈诚的“火箭式”成长，与其“保定系”、“黄埔系”和浙江人的身份不无关系。又如，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和连襟孔祥熙，在其担任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20余年里，始终掌控着国民党政权的财政大权。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也无疑是国民党离心离德、加剧执政资源生变和流失的一个重要诱因。

执政资源的嬗变，终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国共两党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1949年10月1日，拥有了足够执政资源的中共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由一个局部执政的党成为了一个在全国执政的党，并开启了长期的全面执政道路；同时，也标志着国民党从此失去了在全国的执政地位，由一个在全国执政的党变成了一个局部执政的党。

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启示

综上所述，人民群众对执政者也是有着“听其言，观其行”衡量标准的。虽然国民党曾经领导过辛亥革命，提出过“民主、民权、民生”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以及“耕者有其田”等执政理念和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而拥有过丰厚的执政资源，但是其政治诺言永远是一张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因此其最终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是历史的必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始终不忘初心，坚持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他们谋福祉，最终获得了在全国执政的足够资源，实现了历史性的华丽转身。实践证明，一个执政党仅有先进的执政理念及政治纲领而不能正确地把握历史机遇、与时俱进地实施改革和兑现诺言，并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就不可能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此也就很难有效预防和抵御执政风险，也就无法扩大及真正拥有足够的执政资源，那么挫折失败就是难以避免的。这一点，对于当前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世界上的其他执政党在继续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执政，扩大执政资源，走好执政道路，都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启示。

[责任编辑：魏 磊]

① 《周恩来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6~347页。

② 李新、陈铁健《最后的决战(1947—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③ 何虎生《毛泽东蒋介石用人之道比较》，《人民论坛》2011年第31期(上)。